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四十五期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编者的话：“血流成沟”是英勇献身的典范，“把猫塞进女人裤裆”是“痞子运动”的原型，两者矛盾又协调地发生在同一场革命的进程中。有识者云：“革命善于利用人的最高尚与最卑劣之情操”。目的就是一切，为达目的，既可以不惜牺牲，也可以不择手段。

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血流成沟”到“引蛇出洞”；再从“万岁万万岁”的“阶级斗争”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和谐社会”，看似颠三倒四，实则一以贯之。

革命历来以替天行道，吊民伐罪，共产大同相号召，以改朝换代的打江山坐江山为路径，“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先是毛蒋之争，再是毛刘之争。毛说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赶到小岛上，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毛毕竟旷古独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尘埃落定，回黄转绿，试看今日又成怎样之天下？

一旦美好的理想（或幻想）破灭，“打江山”的意识形态难免让位给“坐江山”的“特殊利益”。

戴老早年投身革命，亲历和目睹了“辩证”的历史。回望来路，痛心疾首。难能可贵的是，在饱经磨难之后，在这个冷血的时代，他的一腔热血从未冷却。他有充分的理由质问：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难道就是这些？

戴老的文字使我们思索：一场纯洁的、正义的革命，为什么并且怎样走向了歧途？

戴煌近作三篇

“血流成沟”的回忆与思考

（一）

1947年8月，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暨华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委陈丕显）和第十二纵队暨苏北军区（司令员陈庆先、政委曹荻秋），准备一起伸出铁拳，痛歼敌人的有生力量。

为了适时报道对敌斗争，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于当年6月调来了三名记者。年龄最大的叫胡捷，约二十三岁，在上海做过工人，参军后做过基层部队的指挥员；年龄居中的是陈清伦，22岁，原苏北文工团团员，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调到苏北地区的报社，已干了两年新闻工作；年龄最小的就是我，19岁，原在苏北文工团（这时已叫十二纵队暨苏北军区文工团）担任创作组（也叫文学组）组长。

一开始，由于到底有何重大的战役行动谁也不知道，我们只能分头到基层部队采写点小稿子。直到当年的8月初，才知道攻打盐城。我和陈清伦去了三十四旅的北门主攻团——100团突击队。

8月10日夜晩，在已扫清外围的据点后，我们的部队开始围攻盐城。我跟着一个突击营向城北串场河上的一座水闸桥进击。

这是由北面接近北城墙的必由之路。天上繁星闪烁。前面阻挡我们前进的守敌开枪开炮，火光闪烁不息。在一阵稠密的弹雨下，我们都从南下的公路上翻滚到公路西边的小土沟里。

沟只有一尺来深，我们只能用膝盖和胳膊肘悬撑着身子匍匐前进。水闸桥头堡内的敌人打来的一串串子弹，在我们的脊背上空噓噓掠过。有的就像一把无形而又极锋锐的大剪刀，剪得沟边的灌木和蒿草的枝枝叶叶，纷纷洒落在我们的身上。队伍的前前后后，时有轻声的呼唤声——“卫生员，卫生员”，这说明有人被流弹击中了，急需包扎抢救。

浅沟中的人流静静地向桥头蠕动……突然，前面火光冲天，传来一阵巨响。敌人的桥头堡被我们的爆破手炸翻了。公路沟里的战士们一跃而起，向水闸桥直冲过去。

（二）

我过了水闸桥，向南边的青纱帐前行。团指挥所，就在这片青纱帐内一个比较高的土墩子上。我要去了解一下当前的敌我态势。

土墩子上有一座两小间的草屋，北面是一个两檐几乎插地的披舍子。草屋正对着城墙的东北角，约四百米。我正在草屋内与团长、政委、参谋长交谈，陈清伦也摸过来了。不久，天色大亮。

虽然有青纱帐，四周都长满了玉米和高粱，但这草屋是建在一个高出农田的土墩子上，高出这青纱帐，城墙上的敌人肯定估计到这草屋内有我们的人。所以，突然射出一颗迫击炮弹。披舍子内冲出一股浓密的白烟和气浪，屋内的电话总机和收发报台的人员捧着总机和电台急忙跑出，被烟呛得咳嗽连连。我和陈清伦被强烈的爆炸声震得双耳嗡嗡响，什么也听不清。只见一位参谋抱着一条腿嗷嗷叫。原来他的一个膝盖中了弹片，鲜血直流。我们大家立即七手八脚地抢救他。

接着，我和陈清伦分了手。他向南，利用青纱帐的掩蔽，去了城墙东北角的主攻营；我向西，去追赶攻打北门的主攻营。

过了一片高粱地，是一条南北向的不到十米宽的小河沟，沟面上平放着一架准备登城用的云梯当桥。城墙上敌人不时打来冷枪，团指挥所通讯员带着我在沟东高粱地里等了好一会，等到枪声沉寂，才快速踏过云梯，跳进沟西的玉米地。紧接着“哒哒哒”地飞来一串机枪子弹，在我们的头上“吱吱吱”地飞过。

我们俩弯着腰，穿过玉米地，来到一片乱坟岗。通讯员把我交给隐蔽在坟头后面的北门主攻营的营长和教导员。

（三）

夜晩十点，总攻开始。我们的炮兵终于开火了。经过一阵急促而猛烈的炮火，冲锋号四起，好多支部队一起跃出乱坟岗，冲出玉米地和高粱地，向黑压压的高大城墙猛扑过去。其中第一梯队的战士们，直指防守严密的土圩子。

不一会，急匆匆地跑来一个通讯员。他带着急呼呼的喘息声向营首长报告：“第一梯队还没冲到土圩子的壕沟边，差不多就倒下了一多半……”

听此紧急报告，营长和教导员立即拨出腰间的驳壳枪，大喊一声“二梯队上，三梯队准备”，就各自端着枪消失在子弹横飞的茫茫夜色中了。

我也跃出乱坟岗，穿过高粱地和公路，越过几乎小半沟烈士遗体，爬上了铁丝网乱七八糟的土圩子，只见圩内人影幢幢，杀声一片。原来第三梯队剩下的战士已与敌人拼开了刺刀。

当看到我方一位小战士在刺中一个敌人的当儿，也被这个敌人刺中时，我快速爬进圩内，从这个敌人身上拔出我方小战士的那支枪也投入了拼搏，大声喊杀泼了命……

一会儿，圩内残敌难以招架，他们响起一阵哨音，纷纷从暗道潜入城内，城墙上的敌人向圩内胡乱扫射。我们的战士又倒下了不少。我以西北角的地堡作掩护，按原路返回，重新进了乱坟岗。

过了乱坟岗，泅过串场河，又走了里把路，到了十二纵队前线政治部宣教部的临时驻地。我与陈清伦相会。他与攻打城东北角的部队一起冲杀，侥幸而还。我也还好，只被土圩子上的残乱铁丝网挂破了点皮。

当太阳高升时，我与陈清伦再上前线。北门已破，国民党飞机刚向北门扔下一些炸弹，我俩匆匆进入城内，然后与 120 团政治处宣教股的同志一起，跟在巷战的部队后边逐屋前进。

近午，残敌退守盐城中学内。经激战后，在我方大喇叭的劝告下，敌师长李铁民为首的成千的残兵败将，纷纷举起白旗表示投降。

太阳偏西，我们跟着部队出了城。部队经过北门的土圩子西边拐弯，这时我才注意到，土圩子西边和北边的壕沟内，烈士遗体已搬运干净，沟底的积水、血水和脑浆混合成一种淡红色的液体。回想那堆了小半沟的遗体，我顿时想到“血流成沟”这个词。在这沟中和两侧究竟倒下了多少烈士，当时我也说不清。加上死在城根和巷战中的人数，少说也有千人以上吧！

这次战斗，一共歼敌 7250 余名，生俘国民党 42 集团军总部少将副参谋长韩伊明、第一师少将师长李铁民、少将副师长彭定一、国防部新闻局少将文化专员杨念熙及以下官兵 3221 人，同时俘获周围好几个县的“还乡团”、保安队 3500 人；缴获迫击炮、六零炮、掷弹筒将近 100 门，轻重机枪 169 挺，步马枪 3000 余支，弹药 30 余万发，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四）

多年来，这“血流成沟”的惨状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忘记。我常常想：从南昌起义到十年内战，再从八年抗战到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屡次恶战，我们打下的并维持的这个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个人服务？究竟是还政于民，还是还政于封建王朝？究竟是数不清的“血流成沟”的烈士和伤员的功劳，还是某一个“领导有方”的领导人独立之功？如果全民都高呼某一个人的“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岂不是恢复了封建王朝的帝王之“尊”了么？

当初我也是个“个人崇拜”者。1947 年春天，我在苏北文工团担任写作组组长，为胡宗南侵占延安，也曾躲在屋后向西北方向暗暗流泪，担心毛老人家的健康与安全。随后自己还作词谱曲，搞了个《歌唱领袖毛泽东》；歌本发下后，苏北特务团还传唱过。1949 年新中国成立，我作为新华社的一名随军记者，还与南京大街上庆祝游行的大队人马同声狂呼过“毛主席万岁”。

1956 年春，在新华社总社听了传达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朱总司令带回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才恍然大悟，由此对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和“极权专制”的情愫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在 1957 年“反右”之后的党内会议上，我仍像在战场上一样，热情响应党的号召，继续整风鸣放，坚信上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表态是真诚的，于是我竹筒倒豆子，根本没想到个人得失，大胆提出了警惕“神化和特权”等论点，结果也被打成了“右派”，经受了长达 21 年的苦难。这样，我对封建极权有了更为沉痛的看法。

（五）

1987年6月，我写了一篇盐城攻坚战的采访记忆片断，题为《胜利之路，烈士们的血肉铺就》，就是要反对把千百万烈士们血肉铺就胜利之路的功德，都独揽到一个人的头上。短文最后说：“几十年来，不论欢愉的时刻，还是苦难的岁月，我常常缅怀过去一批批倒在血泊中的先烈，默默流泪。今天，我们这个新社会虽已衣食无虞，但由于党风正气的衰颓，往昔的革命精神、同志友情、党与人民的血肉相联的关系反而十分淡漠的现象，却泛泛可见。这不能不令人在对先烈们的缅怀中，伴随着难以拂却的伤痛和悲愤！但愿我们所有当年心怀壮志投身革命洪流的人们，以及甘愿踏着用鲜血铺就的道路坚决走下去的子子孙孙，团结奋起，把20世纪的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不是含污夹垢、拖泥带水，而是光明正大、健康无邪地继续下去，直到先烈们的壮丽心愿全部实现！”

总之，这“血流成沟”使我联想得很多很多。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一一道来，只能就此搁笔。有何见教，敬希慨助。

2006年9月24日于京

我所遇到的“阶级斗争”

（一）

1947年秋，苏北敌后个别地区也搞土改。那时，我刚当记者不久，路过阜东县的一个村庄，正逢这个村庄开批斗会。

站在众乡亲面前的是一群少妇或大姑娘，想来一定是村子里地主、富农的女儿或儿媳。只见一些“土改根子”、积极分子和村干部，各抱着一只吱哇乱叫的小猫走上去，勒令这些年轻的女子解开各自的裤带，敞开裤腰，把这些活蹦乱跳的小猫塞进她们的裤裆，接着又亲手把她们的裤带勒紧，并扎好她们的两条裤腿，让那些小猫在里边乱抓乱咬，疼得那几位年轻妇女满脸羞愧地又扭又跳，大喊“救命”。有的乡亲，尤其是妇女，用双手遮住自己的双眼，而那些放猫的人和一些村干部却哈哈大笑。

我因从部队采访回来，只是从那儿路过，既不知道那村庄的名字，也不认识那村子里的任何党员和干部，所以当时没说什么话，只是憋足一肚子气。回到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暨苏北军区政治部，我就大骂这种人没有人性，是畜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羞耻，什么叫“革命”。同时认为这是一群野兽，极端野蛮和卑鄙，与“革命斗争”根本沾不上边，这是侮辱和破坏了“土改路线”。就是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家的儿媳、大姑娘，她们又何罪之有？为什么要这样作践她们、侮辱她们？这叫“阶级分明、立场坚定”？

看我这样气愤，大发议论，政治部宣教部宣教科长兼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社长张牧，连忙将一只指头竖挡在自己的唇边，悄悄地说：“小六子住口，不要再说一句话！”

我在家排行最小，是老六，小名“戴小六子”，参军后，有些年龄比我大的人，开玩笑时也叫我“小六子”。张牧当时27岁，比我大八岁，而且又是有名的新安旅行团的老团员，想来他目睹极“左”行为比我多得多，这种行为，往往是“上面”有权的人喜欢做，还叫做“立场坚定”，所以才叫我不要再发宏论，免得惹来一身祸，吃不了兜着走。

听他这一说，我只好不再吭声，但内心中一直耿耿于怀，难以想得通！

（二）

建国以后，更有很多年月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单是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与

人斗，其乐无穷”，就使人刻骨铭心地永远难忘。

1969年春天，我在天津茶淀附近的清河劳改农场582分场“右派”小队劳改。农场遵奉“上峰”指示，对刑满释放和劳教期满留场就业人员（俗称“二劳改”）划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结果，凡是贪官污吏、小偷流氓、盗墓贼、强奸犯、奸商骗子都被划成了“内矛”；而所有的“右派”，包括我这样经历过革命战争、和敌人拼过刺刀、只在“反右”之后的党内继续整风鸣放会上提醒警惕“神化和特权”的人，都被划为“敌矛”。我们所有“敌矛”都排成队，看着“内矛”们成群结队地摇旗呐喊，耀武扬威。

这种黑白混淆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就是看你对极权统治是否有不同观点，这观点是否对极权统治构成威胁。那些社会渣滓，对“极权”无大妨碍，所以就划为“内矛”，这叫“团结大多数”。可是，这将导致全社会的道德良知的倒退与溃灭。现在的社会毫无诚信可言，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三）

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涉及到有关的人？我心存疑惑。后来我读到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年出版）。那时他是政治局七常委之一，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反右”五人小组组长。他一上来就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目前的全民性的大辩论，解决了和正在解决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否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他接着又说：“这个运动要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绝对不容动摇。党的各项基本政策，例如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合作化政策、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等，绝对不容动摇。”

是这样吗？就拿我这个“右派”分子来说，我压根儿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相反我坚决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维护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革命战争中不顾个人的生死，经常身临最前线，而只因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在“反右”之后的党内会议上提了一些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这与“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这完全是打压，而不是什么“辩论”和“说服”，是“极权主义”和“封建主义”，所谓“民主集中制”只是挂羊头买狗肉罢了。

此外，就拿“合作化”、“统购统销”、“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等政策来说，今天又怎么样？在和平发展、和谐社会与过去180度大转弯中，这些都成了历史陈迹，正是邓小平自己在“改革开放”的口号下，换了一副面孔。

当时他还说：“在运动中，党内的右派分子暴露出来了。从党内发现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对我们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意义。”

这是否就是他的真实思想？不得而知。后来看到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内收1938——1965年“经作者同意”出版的四十多篇文章，1957年那篇《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却没看见。他想与“反右”划清界线了。正如有人评价隋炀帝：“其辩足以拒谏，其才足以饰非”。不过，即便这篇讲话没有被收录，却无法从历史中删掉。

而历史自有公断。

2006年9月26日于京

蒋介石解决陆铿的问题及引发的联想

1947年8月11日，我军取得了强攻苏北盐城的重大胜利，在残敌投降的盐城中学的土圩子里，我作为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的记者，与另一位记者陈清伦，搜集敌人的乱七八糟的宣传品和零星报纸。我们发现，在当年7月29日的《中央日报》第四版头条，居然刊登了《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 财经两部奉令查明》的消息，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了3亿8千多万美元，占国内同期售出外汇的88%……

这使我们很纳闷：“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我们的口头禅，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怎么也骂起宋子文、孔祥熙来了？当时我们百思莫解。

1949年4月，强渡长江，南京解放。我从《中央日报》地下党的同志和一些留在大陆拒去台湾的报社工作人员口中，才摸清了这档子事的原委。

原来那时《中央日报》的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陆铿，是个直性子，外号“天声”。他曾受肖乾引导，做了新闻工作。对于《中央日报》，他主张“先日报，后中央”和“新闻第一”。1947年夏，孔祥熙、宋子文以“扬子”和“孚中”两公司的名义，向中央银行结汇3亿8千多万美元（当时美元与黑市价相差十多倍），从国外购买禁止进口的汽车、无线电器材等，运到上海抛售，牟取巨额利润。在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上，素有“黄大炮”之称的贵州籍参政员黄宇人为此开了一炮，并吁请当局从速彻查，惊得与会参政员都面面相觑。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俞鸿钧答复这一质询时，开口闭口都是“最高当局”的“意思”和“指示”如何如何，驴头不对马嘴。这使得当时在会上采访的陆铿非常气愤。他一回到《中央日报》，就布置全体记者，集中全力设法搞到这一案件的全部材料。最后终于在青年党人陈启天主持的经济部里，将财政部和经济部的调查报告，连骗带偷地弄了出来。他随即发动好几个记者、编辑加紧誊抄。第二天，即1947年7月29日，《中央日报》第四版头条就刊出了那样的消息。这立即引起了中外轰动。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都纷纷转载；外国驻南京的记者也将这个消息传到国外。宋美龄为此大发雷霆，一定要蒋介石追究责任，否则就和他离婚。

当天下午，蒋介石在黄埔路的“官邸”召集紧急会议。蒋介石在会上破口大骂“娘希匹”，一定要追究责任。同时，老蒋和他的“智囊”们还作了各种分析研究：这是个人的职业冲动，还是政治图谋？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还是共产党人在其中捣乱？当时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判断：可能是尾大不掉的陆铿等人由于职业冲动而胡干的。但老蒋不相信，决定叫李惟果和陶希圣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的名义，直接找陆铿弄清消息来源，然后再作处理。

经过两次谈话，陆铿坚决表示新闻记者有不泄露消息来源的义务并说这是必须遵守的信条。至于发表这消息的动机，完全是为国民党着想，而不是使国民党更坏。至于蒋介石说什么他是“总裁”，陆铿是党员，他以“总裁”的身份命令陆铿立即讲出消息来源，陆铿回答的是：“那好，我马上退出国民党。”

这两次交谈后，陆铿接着就打起了小包袱，准备坐牢。8月2日听说李惟果驾车来到《中央日报》楼下，陆铿即拎着包袱下楼。李惟果一见这模样，就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准备坐牢。李惟果说：“瞎说！总裁要亲自问问你！”

李惟果边说，边把陆铿拉上汽车，直开黄埔路的“官邸”。蒋介石见了陆铿第一句就问：“什么人告诉你的？你说！”

陆铿说：“能不能让我多说两句？”

老蒋很不耐烦，但也没说“不可”。于是陆铿就将自己见到的国民党多种腐败现象逐一列举，特别把他在豫北采访王仲廉部的亲身感受，详详细细地和盘托出。他说前方士兵艰苦作战时想喝一口水都不可得，因为国家没钱给他们买水壶；而后方的官僚们却穷奢极侈，国人的怨恨都集中在孔祥熙、宋子文身上。《中央日报》揭露孔、宋等中央大员，正表示国民党“不同流合污”，蒋总裁是“大公无私”……说了一些“捧场”的话。

陆铿一口气说了半个小时，最后要求蒋介石给予处分，李惟果马上站起来说：“报告总裁：惟果负责宣传部，有负总裁嘱托之重，请求给惟果处分。”蒋介石脸上的怒气全消了。他也跟着站了起来竟连着说：“我什么人也不给处分，我什么人也不给处分。”

于是，这场闹剧就此谢幕拉倒。

事后，陆铿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处获悉：原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德迈跟蒋介石谈话时，无意中谈到这件事，竟赞扬这是“民主的表现”。老蒋听了就更加不了了之了，并以此说服了宋美龄。

对蒋介石，人们是十分憎恨的，因为他杀了我们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如此罪恶滔天的“蒋光头”，也不得不在“民主”的旗号下网开一面，饶恕了陆铿。

陆铿后来离开了国民党。1957年大陆“整风鸣放”，他提了一些意见，结果说他反党和攻击“老大哥”，在共产党的政权下坐了18年牢。

我常想，如果解放后，咱们的《人民日报》也有类似陆铿这样的人出于“职业的冲动”，指责某个在位高官是政治投机分子或贪官污吏，“最高指示”又会如何？他的个人命运又是什么下场？

2006年9月25日于京

作者简介：戴煌 原名戴澍霖，1928年2月12日生于江苏省阜宁县沟墩镇。著名作家、记者。著作有：《九死一生》、《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直面人生》、《新格斗》、《请牢记“造神运动”教训——庆祝新中国五十华诞而作》等。

稿 约

《往事》至今已发出四十五期。作为一份以交流为目的内部读物，面对困难环境，个中甘苦，自不待言。但在新老朋友共同努力下，它一直支撑到现在。在此，我们向一贯支持我们的读者和作者致谢！

《往事》的稿件内容为回忆文章、访谈、专题和学术文章等等，文章篇幅为八千字以上。除原创文章，您也可以向我们推荐精彩的文摘和网文。您还可以将您即将发表的文章先投给我们。《往事》也欢迎您一时不便公开发表的稿件。

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我们，不吝赐稿。